

在亞洲  
思考歷史學

趙軼峰  
著

中華書局

# 目 錄

緒 言 / vii

## 第一章 亞洲現代歷史學的國族主義底色 / 1

一、在亞洲語境中定義民族、民族主義、國族主義 / 3

二、國族重構與中國現代歷史學 / 9

三、韓朝現代歷史學與國族主義 / 38

四、日本現代歷史學的國族主義色彩 / 51

五、印度國族主義歷史學 / 73

結語 / 82

##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與亞洲歷史編纂學 / 93

一、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長期發展 / 96

二、馬克思主義在印度現代歷史學中的表現 / 125

三、日本現代歷史學的馬克思主義印記 / 132

四、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朝鮮史學話語中的體現 / 142

結語 / 149

### 第三章 亞洲歷史意識中的現代化、現代性 與殖民現代性 / 153

- 一、亞洲的後發現代化及其與殖民主義的糾結 / 157
  - 二、現代主義與亞洲歷史學中的現代化論 / 162
  - 三、亞洲的殖民主義史學 / 179
  - 四、印度歷史敘述中的「底層研究」與後殖民主義批判思潮 / 191
  - 五、韓朝歷史編纂學中的「殖民現代性」問題 / 204
- 結語 / 212

### 第四章 歐洲中心主義——亞洲歷史的西方意象及其反撥 / 217

- 一、歐洲的現代崛起與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 / 219
  - 二、亞洲歷史觀中的歐洲中心主義 / 228
  - 三、歐洲中心主義的替代、反撥及爭論 / 234
  - 四、重述地方史與全球史的興起 / 248
- 結語 / 254

### 第五章 亞洲歷史學對科學性的迎拒 / 261

- 一、唯科學主義與現代亞洲歷史學的實證底色 / 264
  - 二、社會科學化的歷史學 / 276
  - 三、年鑒學派、社會史與歷史人類學 / 284
  - 四、歷史學是不是科學——一個老問題 / 306
- 結語 / 320

### 第六章 後現代批評思潮的亞洲迴響 / 323

- 一、凝視西方的亞洲歷史哲學 / 325
  - 二、亞洲歷史學的「後現代」拓展 / 331
  - 三、後現代主義歷史學的得失 / 337
  - 四、舊話重提：歷史是什麼？ / 362
- 結語 / 378

### 第七章 在亞洲思考歷史學 / 381

- 一、亞洲現代史學理論的軌跡 / 383
  - 二、被低估的中國傳統歷史學 / 386
  - 三、新實證主義歷史學的可能性 / 398
- 結語 / 407

### 後 記 / 411

# 緒 言

我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關注史學理論，因為原以明清史為本業，史學理論的鑽研時斷時續，但研究和思考從來沒有停止過，90 年代在加拿大研讀期間，也把許多精力放在史學理論方面。2013 年，陳啟能先生邀請我在他所主持的史學理論重大課題中承擔關於當代亞洲史學的子課題，為此開始把亞洲作為一個史學理論的地域性單元來思考。但是在陳先生龐大的計劃中，中國史學作為重要部分單列，而我負責的亞洲史學因分工方式而不包含中國，覺得所有的分析都少了一個參照和言說的基本對象。這在陳先生的總課題中並不是問題，因為他會在統合的層面，對所有子課題的研究加以綜合；對我自己說來，卻成了一個「有上稍來沒下稍」的事情，於是就形成了目前這個把中國與韓國、日本、印度史學理論納入同一個考察框架中的課題。前一課題在 2017 年基本完成，交付陳啟能先生審查。該課題主要是分國別梳理了韓國、日本、印度現代歷史編纂學的核心資料和各自的推演過程，儘量辨識了三國歷史編纂學的觀念和話語線索。納入中國並進行更深入的整合分析，則恰好是這一課題的任務。這樣，這一課題的基本目標，是把亞洲現代歷史學作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對象加以考察，同時由於前一課題偏重於對韓、日、印三國歷史編纂學推演歷程的梳理和分析，而關於同一時代中國歷史編纂學演變的一般情況，相關研究已經較多，此課題的重點，就着落在綜合、比較和透視的層面。中國史學界對本課題研究時間範圍的日本、韓國、印度史學面貌皆有所考察，但不充分。關於日本史學的研究略多而系統化不足，對於韓國和印度史學的研究局限於個別問題，對於中國史學在此時期的研究則汗牛充棟，缺少的主要是與他者的比較分析，理論剖析也存在很多再深入的空間。在此情況下，本課題作為一個

項目工作所受時限，以及研究者語言能力的一些欠缺，也使之難以全面覆蓋相關的各種學術資訊，與其勉力爭取全面周到而最後又不能真正達成，不如提出若干重要話題做相對深入的討論。因而，本書採取問題結構，以問題探討與敘述結合的方式，梳理並分析當代亞洲歷史編纂學之理論觀念的由來、現狀和特質。這樣做，無疑是把一個可以主要通過梳理來完成的工作，變成了必須通過深入分析才能獲得明確結果的工作，研究的難度大大增加。這是對自己的挑戰。研究的進展也比預計的遲緩得多。

本書的標題是在結項之後改擬的。原項目題為《史學與社會——當代亞洲四國史學演變比較研究》，實際界定了這本書的基本特點。「歷史與社會」作為研究的基本視角，意味着從社會狀況，包括特定時代社會演變的歷史主題，來理解歷史家理解、看待和敘述歷史的方式。這當然並不是什麼新穎的方法，但迄今為止，並沒有看到運用這種方式統合地思考亞洲歷史編纂學演變的著作。而且，「社會」宏遠複雜，觀察者所擬定的研究方案，千差萬別，落實下來，也就不同。這本書，根本說來，是關於史學理論的。從理論層面來看社會，必須深入，卻不可能具體。又因為覆蓋地域宏大，時段較長，所以「社會」是就長時段演變而言，並非限於與「國家」對應的民衆或民間，是對於亞洲四個組成國家的社會共同體的概括性稱謂。選擇中、日、印、韓／朝諸國為研究對象，並不意味着認為亞洲其他國家現代史學乏善可陳，而是因為個人研究能力所限，終究無法將各國史學逐一考察。我恐非僅現在，未來若干年內，亦無力再加擴展。這種遺憾只好由它，期待將來其他學者做更周全的工作。「比較研究」最初是因為受陳啟能先生之命而做其子項目而起，研究過程中也的確儘量去將各國的歷史學比照、關聯地思考，但是因為分別的研究畢竟都不夠深入，所以所謂比較，主要是呈現出亞洲各國現代歷史學之背景、觀念、心理方面的牽連及其異同。亞洲現代歷史編纂學的形成，與亞洲各國的現代化社會轉變是同步的，因而各國現代社會轉變的歷程和方式肯定地構成理解其歷史編纂學面貌和特質的基礎。亞

洲各國現代社會轉變的方式、經驗、迄於今日的狀況則既有共性，也有巨大差異，辨識共性，分析差異的歷史編纂學印記，同時考察歷史編纂學如何作用於亞洲各國社會演變的實踐歷程，是本書思考的基本路徑。

現代亞洲歷史編纂學雖然一直被高高地安放在學術的殿堂中，卻也一直是現實的工具。這並不僅僅表現在極權狀況下的權力控馭學術，更普遍的情況是各時代的「主流」歷史家們以各種方式把歷史學作為自己參與現實的手段。這類情況並不能否決歷史學作為學術的資格——很可能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但再次提醒我們對於歷史學的性質再加思索。歷史學是社會生態系統中的林木，在社會流行的價值觀、文化傾向、個人與群體利益、科學尺度匯融的環境中生長，那麼學理的、利益的、文化的因素在現代亞洲歷史學的推演中究竟如何相互糾結、作用？這種糾結、作用在純學術意義上又意味什麼？

奇妙的是，作為學術的現代歷史學無論如何被具體的社會現實影響甚至塑造，受到文化差異性的作用，卻常常是高舉着普遍性的旗幟的——所有公開主張的歷史學見解，都自詡具有某種真理性，即使明顯帶有相對主義色彩的後現代主義歷史學也是如此，否則它就無需花費巨大的氣力去解構據稱佔據了主流地位的「現代歷史學」。於是，歷史學的普遍性與現實性訴求是如何耦合在一起的，也成了無法迴避的問題。現代歷史學藉助普遍性共識而形成，然而在多國比較的視野下看，亞洲歷史解釋差異之大，超過世界其他地區。這種差異的根源肯定既存在於社會現實和價值立場方面，也存在於歷史學的理論層面，然而迄今的相關討論，依然支離或者模糊。亞洲歷史觀和歷史敘述、歷史解釋的衝突，如果僅僅被歸結為現實立場的不同，史學理論就是蒼白的。沿着時間的順序梳理，亞洲現代歷史學從追求普遍性開始，但走到晚近時期，卻發現自己處在對普遍性空前遲疑的氛圍中。歷史學家們對歷史學本質的共識沒有明顯增強，而是不斷削弱。這就把對於一些重大歷史經驗的闡釋方式差異凸顯出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沒有像今日亞洲這樣，圍繞晚近歷史呈現如此尖銳的分歧。這究竟是表明亞洲歷史的特殊

複雜性，還是表明亞洲史學理論的貧乏？在亞洲現代歷史學發展中無所不在的西方史學理論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仍在尋求普遍性的歷史學家與已經不再尋求普遍性的歷史學家之間，究竟有怎樣的差異？這些也是在考察中不時觸及的問題。

區域或國別視野下的歷史學不能沒有文化的關照，文化性的緣由都是由來已久的，所以相關的考察必須在較長時段範圍的梳理中展開。因而，雖然本課題以晚近亞洲歷史學的分析為目標，其思考的起點卻必須回溯到現代歷史學的開端。這一思路帶來了多少有些意外的結果。研究發現，亞洲現代歷史學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連續性相當清晰，而斷裂性或者說變異比一般預想的模糊得多。當下亞洲歷史家的思維方式，雖受晚近各種新思潮的調劑、中和、影響，但與現代史學的百年新傳統之關聯依然深切。這就更凸顯出長時段透視的意義來。要了解晚近的史學思潮，畢竟還要有整個現代歷史學演變的景深。

「亞洲」成為研究的地域單元和任何其他小於「世界」的地域成為研究的單元一樣具有合理性。但是這種範圍界定在史學理論的語境中展開時，是否能夠達到足夠有效，取決於研究者如何把握亞洲歷史編纂學的地域共性、關聯以及內部差異導致的張力。否則，亞洲就成了一個裝載互不相干事物的籃子。「歷史與社會」作為一個觀察的視角就是為了把握了解共性的範圍——如果歷史學與社會演變的確存在一種共振的關係，那麼，亞洲各國歷史演變的共性也就承載着歷史學的共性。

亞洲各國的現代歷史學都是與其現代化社會形態一起展開的。雖然各國歷史學家中都有人努力論證本國早已有之的現代性，並都提出了一些證據，但是在 19 世紀後期以前，那些本土現代性的因素、萌芽都還沒有帶來持續快速的現代社會轉變。19 世紀中葉前後發生在亞洲的中西方文明衝突，這場衝突帶來的危機、知識、技術則促使亞洲各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入了社會基本形態的急速轉變過程，其中包括歷史學的現代化轉變。而亞洲「後發現代性」轉變所不可避免的對西方事物的借鑒，也投射在以近乎「革命」方式崛起的亞洲現代歷史學中。於是，我們看

到亞洲各國現代歷史學的興起幾乎是同步的，並且，都把當時歐洲歷史學的觀念、方法、理論、話語作為重構本土歷史學的主要資源，同時對先前的本土歷史學做了批判、反思和揚棄。當時湧進亞洲的西方歷史學是一系列社會觀念的組合。其中，進化論、國族國家觀念、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是大量直接進入歷史學話語的思想傾向，而其背後，又有不同方式的理性主義、西方中心主義，這帶來了亞洲歷史學的一種新的共同話語和世界性，向某種「現代」社會轉變的社會推演旋律也一直伴隨着後來亞洲史學的發展。

然而亞洲各國原本國情不同，其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不同，各自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以及選擇不同，先前的歷史學傳統也有差異，因而各國因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現實需求，對西方歷史觀做了選擇性的重述，這種重述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響了其後來的歷史發展。於是，從差異的角度去觀察各國歷史編纂學的推演，可以看到不同的特色。

中國歷史學傳統悠遠深厚，而且在 18 世紀曾有本土經學與史學研究中的考證學發展，形成與歐洲實證主義史學對接的較為便捷的條件。在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歷史學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傳統學術與歐洲實證主義史學融合的結果。但是這種對接雖然涉及學術觀念的轉變，畢竟還是技術層面的。中國歷史學家那樣積極地擁抱西方的實證主義歷史學與其說是由於對西方的實證主義史學一見鍾情，不如說是因為西方事物整體地顯示出一種進化競爭的強勢。歷史學家們不過是用自己專業的方式去擁抱了當時影響亞洲的西方社會思想、哲學和學術理念。比如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和史學革命，運用的思想工具主要是進化論和包含民權思想的國族國家理論。稍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大思想動力，歷史學也隨着社會變革而形成馬克思主義高度主導而以中國自身命運的歷史闡釋為核心的局面。日本史學傳統遠不及中國深遠，又在現代化轉變中選擇脫亞入歐，對西方史學的追隨更為果決，一度成為中、朝史學界矚目之所乃至了解西方史學的中介。但日本社會在快速發展中走向對亞洲鄰國的侵略擴張，歷史學成為論證日本國策的學術淵

藪，便形成技術上崇尚實證主義，社會關注和論證指向服務於日本擴張的更為外向的東洋學。又因為其侵略擴張失敗，遂有二戰結束之際的一段特殊史學歷程——在走向多元化的廣義戰後歷史學中長期保留着一個反省戰前歷史學的話題。韓國在歷史上長期處於強大鄰國勢力之間，藉助國族國家意識在現代化過程中重新敘述乃至建構國族自我的歷史背景是其突出的主題。這種探索因日本吞併朝鮮而一度夭折，半個世紀的殖民地經歷之後再度建國，使得國族主義在多種社會思潮中持續凸顯。但是，國族主義史學強調本土歷史傳統與現代社會的契合，而殖民地經歷則提示現代社會由他者塑造的記憶和被統治的屈辱，以這種糾結為基礎，當後現代、後殖民主義批判思潮湧現的時候，「殖民現代性」就成為韓國歷史編纂學中一個特別突出的話題。印度曾經徹底落入殖民地境地，至今外來英語為其官方語言，故西方文化、制度，包括歷史學話語、理論對印度的影響強於亞洲其他國家，印度現代歷史學的起點不是國族主義史學，而是殖民地史學——這使印度現代史學與中國、日本形成強烈反差，與韓國也有不同，西方史學則與印度現代史學在這樣的歷程中更深度地融合。這種融合並不能消解獨立後的印度歷史敘述中的內在張力。印度在 20 世紀中葉實現民族獨立以後，本土傾向強勁襲來，因而，印度現代歷史學帶有高度西化和不斷探索印度國族文化自我的雙重特色，其獨特性更多體現在問題指向的社會深度方面，其中，底層研究影響最為突出，而後殖民主義史學則是理解印度現代史學的核心。

本書分為七章，為便於比較和綜合分析，各章皆以一個帶有共性的史學現象為中心。

第一章「亞洲現代歷史學的國族主義底色」考察現代國族國家觀念在亞洲各國現代史學演變中的投影。如前所說，國族國家的興起是亞洲現代歷史的帶有突出共性的重大主題，國族國家意識又是該時代西方歷史學的基調，這就為現代亞洲歷史學塗上了一層濃重的共同底色，從中可以看出亞洲各國歷史學的共鳴。但是國族主義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兩面性——在推崇國族和國族國家基本價值層面，這是一種普遍的即世界性

的思想意識，而在具體認同對象層面卻以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方式表現出來，把思考者自己認同的國族國家利益作為第一位的。這樣，國族主義觀念的共同底色就絲毫不妨礙亞洲國家內部發生嚴重的歷史觀衝突。其實相反，亞洲歷史觀的衝突有國族主義作用於其中，這裏包含比較複雜的具體問題，要在該章展開討論。同時，國族主義底色在各國不同的歷史經驗中與其他因素交融，呈現出各自不同的局面。韓國官方曾經公開提倡以國族主義思想書寫歷史，歷史學家的國族歷史敘述頗具悲情色彩。日本的國族主義常在亞洲主義話語背後，帶有外向擴張性，歷史研究的問題指向也是外向的。中國國族主義以國族整合為基調，長期聚焦於對族群關係與一體性的探索。印度社會在殖民地經歷中已發生比亞洲其他國家更深的改變，國族主義史學在其現代歷史學中只是一條伴隨線索。國族建構的現實必然伴隨一定程度的國族自我意識和相應的社會主張，但強烈的國族主義會導致歷史敘述中主觀性、價值介入的強化。如何看待亞洲歷史編纂學中浸透的國族主義，國族主義在當代亞洲歷史思維中如何發生作用，是此章要考察的中心問題。

第二章「馬克思主義與亞洲歷史編纂學」考察馬克思主義在亞洲各國歷史編纂學中展開的樣態。馬克思主義是原出歐洲而產生世界性迴響的學說，對於亞洲各國社會演變發生的影響十分顯著，各國歷史編纂學的相關表現則有諸多差異。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相關表現最為持久，形成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的局面。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早期主要從蘇聯學術界轉介而來，已經帶有濃重蘇式詮釋成分，20 世紀 80 年代形成反思。日本學界接觸馬克思主義更早，但未成主流，除了戰後前十年影響力較高之外，主要表現在社會經濟史領域，是多樣歷史學潮流中的一條支脈。韓朝歷史編纂學中的馬克思主義最初在殖民地時期由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傳來，在韓國的民族主義史學興盛而注重反撥殖民地史學的潮流中沒有成為主流，在朝鮮則因「主體思想」作用而發生特殊變異。印度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 20 世紀中後期有活躍表現，但從來沒有意識形態化，一直是多種史學思潮中值得注意的一脈。

第三章「亞洲歷史意識中的現代化、現代性與殖民現代性」，以現代化社會變革這一亞洲歷史的另一主題作為透視歷史學演變的軸心。亞洲各國的現代化轉變，都是在歐洲率先進入現代化演變歷程並在亞洲展開一場世界性衝突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後發現代性與歐洲的原發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後發現代性的展開都具有危機應對的性質，另一個重要區別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與傳統慣性構成嚴重、內在衝突。具體在亞洲，後發現代性還與殖民主義相關聯，造成一種殖民現代性現象。殖民現代性是殖民統治與現代化社會轉變相伴隨的歷史現象，出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後發現代性的一種很普遍的實踐樣貌。亞洲，印度殖民地化歷時最久，殖民地時期發生了諸多與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方向一致的社會變動，但主權在人不在己，國族國家形成大幅度滯後，國族他者的歷史敘述與印度國族本位的歷史敘述無法徹底切割，又有深刻矛盾，複雜糾結，在理論上與後殖民主義思潮最為契合。朝鮮半島曾淪為殖民地半個世紀，其間發生一些與現代化方向一致的社會變動，但主權喪失，且日本殖民地的高壓性超過英國在印度的程度，這為韓朝歷史學建構國族歷史的訴求增加了複雜性。中國現代歷史學也是在社會快速轉型中形成的，且有約一個世紀的「半殖民地」經歷。但與印度、朝鮮半島相比，中國的「半殖民地」從主權喪失程度角度看比較模糊，從被殖民化區域範圍看也遠未覆蓋中國之「半」，持續時間亦短，故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取決於中國自身選擇的成分更大一些。日本也是後發現代化國家，但先是迅速成為殖民者，後又在被佔領國狀態下走向高度西化，現代化、殖民帝國、被佔領國歷程相互糾纏，形成更為複雜的歷史景觀。後發現代性和殖民現代性構成晚近亞洲現代歷史學深切的經驗關照，也是諸多歷史紛爭的癥結所在。通過對後發現代性的分析深化對現代化歷史觀理論內涵的認識，把殖民現代性問題置於亞洲的框架內重加審視，是本章的主要課題。

第四章「歐洲中心主義——亞洲歷史的西方意象與反撥」，討論始終籠罩於亞洲現代歷史編纂學之上的西方對於亞洲歷史的敘述在亞洲

歷史學界造成的影響。亞洲各國現代歷史學既然是後發現代性的表現之一，且皆藉助歐洲歷史學而興起，學習和借鑒西方就是一種基本姿態。然而，西方的亞洲歷史敘述既含諸多合理、可取的觀念、方法，但也含有大量偏見，且在不斷推演變化。如果把西方學者的亞洲歷史敘述連貫成為一個大致的譜系，就可以看到，東方主義和歐洲中心論是由濃轉淡但迄今沒有從理論上徹底論證清楚的一種色調。這種色調的基礎，一是早期歐洲人亞洲知識的局限，二是歐洲理性主義思潮興起以後的真理自信和東西方兩元思維。也是在這種意義上，東方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東方主義描繪了一個專制、停滯、缺乏理性和自由的亞洲；歐洲中心主義以普遍歷史規律的名義把歐洲歷史作為衡量他者歷史的尺度。這些原出於西方學者的言說，在亞洲現代化歷程中深度滲透到諸多亞洲歷史學家的歷史敘述中，而反思日益增多，卻從來沒有徹底。難點，其實在於現代性這種普遍認同的價值與西方歷史經驗的一致性超過其與亞洲歷史經驗的一致性，以至於，反撥歐洲中心主義的論說或是表現為別設中心的反向論說，或者受到現代性價值認同及普遍歷史規律論的牽絆。況且，現代亞洲歷史學在理論層面一直矚目於西方歷史學，西方歷史學卻並不曾真正關注亞洲歷史學的經驗，這種局面至今沒有改變。東方主義與歐洲中心論在亞洲歷史編纂學中的表現，要在本章加以梳理和分析。

第五章「亞洲歷史學的科學化訴求」討論在亞洲歷史學演變歷程中始終佔據突出地位的關照科學思考歷史學基本屬性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世界範圍內的「現代歷史學」一直伴隨着與科學的糾結。藉助於向科學靠近，歷史學躋身現代知識體系。20世紀大舉進入亞洲的西方客觀主義或實證主義歷史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籠罩着科學主義的光環，才在亞洲歷史學傳統面前展現出「先進」性。為此吸引，中國傳統考據、文獻學迅速找到了通過實證和客觀性獲得科學性徵從而變身為現代歷史學合法組成部分的通路；經世學術與社會變革的需要也通過科學化的歷史學看到了通過普遍性法則來解答亞洲社會現實問題的途徑。科學化成為20

世紀前期、中期亞洲歷史學的突出訴求。基於這樣的新傳統，亞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從來沒有遭遇重大阻礙，並且能夠伴隨社會科學的新潮流不斷調適，與時俱進。然而，到了 20 世紀後期，已經與科學，最少是社會科學結成不解之緣的亞洲歷史學追隨着西方歷史學的推演遭遇了對歷史學科學性的強力質疑。在 80 年代以後的開放、求新浪潮中，將歷史學徑直視為科學的觀念蛻變為只有少數人堅持的細流。即便如此，理析亞洲現代歷史學的演變歷程，仍然可以看到科學性訴求所產生的巨大作用。如何在對於歷史學屬性的認識調整中把握科學性的分寸，成為關涉亞洲乃至全球歷史學未來的重要問題。

第六章「後現代批評思潮的亞洲迴響」考察 20 世紀後期以來亞洲歷史編纂學的新動態。亞洲現代歷史學所受西方歷史學的影響，根本上說是在於歷史哲學的影響。亞洲各國皆無發達的歷史哲學傳統，在現代歷史學興起時代皆大規模取用了源自歐美的各種歷史哲學乃至方法理論，久之幾乎成為在理論層面凝視西方，在西方不斷產生的各種社會歷史思潮中選取適用學說的思維定勢。即使亞洲史學家對於東方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所做的批評，也多要借諸來自西方的話語和思想。西方在 20 世紀後期興起多種批判性社會思潮，包括後現代主義史學、歷史人類學，亞洲史學界皆結合「全球化」話語的流行而一一回應，形成歷史學多樣化的格局。這種多樣化極大地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增加了歷史研究的手段，也銷蝕了歷史學中一些長期難以克服的機械論和教條。與此同時，卻也引發了歷史相對主義傾向的流行，歷史學的根本性質遭受拷問。亞洲歷史學界，由於其始終沒有根本擺脫的哲學貧乏，在此浪潮中基本上是隨波逐流，獨到的理論創見始終不如人意。

第七章「在亞洲思考歷史學」在前述各章基礎上進行綜合性討論，要點是在國際歷史學演變的視野下重新思考亞洲歷史學未來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亞洲現代歷史學已經走過的歷程是一個伴隨西方歷史學旋律起舞的過程，正如這個時代亞洲社會的變遷伴隨着西方的旋律一樣——即使是與西方衝突的舉措背後也有西方的理念作用。這背後的原因和原

理複雜，難以在這裏全面討論，但僅就歷史學而言，卻應該也可以去做些批判性的思考。西方歷史學的成就怎樣評價也不過分，亞洲歷史學受惠於西方歷史學者，遠大於西方歷史學所受惠於亞洲歷史學者。但是，西方歷史學晚近時期似乎進入了一種迴環往復的境地，就如年鑿學派的從閣樓到底層，又從底層到閣樓，從宏大敘事到微觀，又從微觀找尋宏大，從敘述事實到尋求闡釋，又從闡釋回歸敘述。又如後現代主義歷史學，從具有巨大啟發性的對現代歷史學的批評開始，往而不復，走到了解構歷史學本身的地步。每一步變化，又都有鏗鏘的理由，即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歸，也一定要解釋出種種昇華來。此章建議亞洲歷史學家不再亦步亦趨，做一種新的綜合，看看能不能對歷史學從根本層面提出一些新的建議來。我在此章概要性地表述了近年提出的「新實證主義歷史學」之大意，權做引玉之磚，期待有更多的嘗試提出。此外，本章也對「亞洲歷史學」這樣的概念做一點節制性的說明。分區域、國家研究歷史編纂學有其合理性，這主要在於過去一個多世紀是一個國族國家興起、強化的時代，也是東方與西方歷史社會處境顯著差別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歷史學的演變，各有國族、地域、文化系統單元的語境。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歷史學又是人類共同的學術，有超越國族、地域、文化系統的共同語境，是人類知識和心智進步事業之一部分。因而亞洲史學的研究，不應指向任何一種新的亞洲主義，而應是推動全人類歷史學融合與共同發展的一種努力。

這樣的理解和選擇，確定本書採用了帶有一定批評性的行文方式。這種方式可能會因對同仁的成就褒揚不足或吹毛求疵而帶來一些違和感和疏漏，我將努力找尋另外的機緣彌補這種缺陷。因為面對一個充滿分歧的話題，如果在一本書中追求無懈可擊的圓融，就難以表達任何清晰的見解。至少，我還沒有掌握那樣的技巧。



## 第一章

# 亞洲現代歷史學的 國族主義底色

對於亞洲各國的社會變遷及其相互關係曾經產生巨大影響的現代國族國家觀念在現代亞洲歷史學中的印記是深刻的。學術界已經有許多與此相關的研究支持這樣的基本判斷。然而，如果我們想要進一步追問下去，就會發現還有許多問題尚無足夠明確的回答。例如，國族主義對現代歷史學的興起產生重大作用是否為亞洲的一種時代共性現象？如果是，其程度如何，各國之間差異如何，為什麼？國族主義究竟如何影響亞洲現代歷史學？國族主義的主觀性與作為現代歷史學突出特徵的客觀主義歷史學或實證主義歷史學呈現怎樣的關聯？國族主義對歷史學的影響在亞洲、歐洲、美洲是同質的嗎？等等。如果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可迴避地會遇到什麼是國族主義，以及國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啟蒙主義、後現代主義批判思潮之間是怎樣的關係等等問題。「亞洲」本身就是一個西來的地域概念，<sup>1</sup> 覆蓋多種文化、學術傳統，所以要統攝地觀察亞洲的歷史學，困難重重。即使如此，亞洲既為一個現代歷史單元，還是有其共性，皆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改造了社會也改造了歷史學。所以，對亞洲現代歷史學的共性和差異做一些觀察，還是可能的。國族主義，就是觀察這種共性和差異的一個突出的線索。

## 一、在亞洲語境中定義民族、民族主義、國族主義

理析國族重構的歷程會大量涉及「民族」和「國族」兩個核心概念的關聯與區分問題，尤其是「國族」概念使用不多，內涵需要說明，故先從兩個基本概念的辨析入手加以討論。

民族在何時形成以及民族的內涵如何？學界至今意見分歧。人類歷

---

<sup>1</sup> 參看趙軼峰：《清前期中朝關係與「東亞」秩序格局》，《古代文明》，2019年第1期。

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基於血緣、地緣、部族的紐帶關係，在共同生活中發展成為具有共同語言、習俗和文化心理的社會共同體。現代華語學術界有時會迴避將此類古代的社會共同體徑直稱為民族，而用單一「族」字，或「古族」、「部族」、「某某人」等等指稱。其原因主要在於，現代漢語中的「民族」在大多數語境中被作為一個具有「現代」特定意味的概念使用，與英語中的 nation，即組成國家的民族接近對應。「民族國家」，被用來對應英文中的 nation state，也被視為現代歷史所特有的唯一主權單元。英語中另有 ethnic group，用來指稱並非一定與國家整合到一起的「族」，在民國時代就已被中國學術界了解，但沒有廣泛行用。這個詞本來可以與現代漢語中的「民族」對應使用，但現代漢語中的「民族」既與 nation 關聯，ethnic group 就不便譯為「民族」，大多譯為「族群」了。這裏的問題是，「民族」既被賦予「現代」含義，在被用來談論前現代的現象時，就成了一種借用語，使得前現代的「民族」怎麼說都是模糊的。<sup>1</sup> 解決之法：應將「民族」界定為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習俗和文化心理的社會共同體，對應於 ethnic group；與國家整合到一起的民族則應用「國族」表示，也即英文中的 nation。用這樣的定義重新來看，亞洲前現代的民族，即具有共同語言、習俗、文化和長期共同生活歷史並形成社會認同的人群，很早就已經形成，其起源與「現代」與否無關，但伸展到了現在這個時代，與國族並存而並不由國族所限定。與此相關，中國學術界乃至亞洲學術界多數情況下所說的民族主義，內涵是「國族主義」，英語中的 nationalism 其實應該被翻譯成「國族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這與 international 被翻譯為「國際」而不是「民族際」同理。進而，通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語境中的「民族」其實是「國族」，「民族國家」應稱為「國族國家」。國族作為與國家組織整合的人群，具有比民族更濃重的國民共同體含義，其中可能包含多

<sup>1</sup> 後文包含這種情況的例證。

個民族，因而可能包含多種語言、習俗、信仰，它們在國家共同體層面形成認同和體制化組織形態而無需放棄自己的語言、習俗、信仰。「民族主義」應該被用來指以 ethnic group 為認同中心的觀念或意識形態，這種觀念與國家認同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既存在於現代，也存在於現代之前。兩者區分之後，許多問題就便於討論了。美國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著作《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中文名中的「民族」也是 nation，即這裏所說的「國族」，當理解為「從國族國家拯救歷史」。在國族概念中，「國」是根本，而不是「族」為根本。國族在歷史上越來越普遍地包容多種民族，而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已經基本絕跡。

國族的清晰界定並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單元，在歐洲歷史上是在 17 世紀伴隨國際競爭完成的。在中國，由於中華文明長期延續性歷程作用和國家組織持續強勢發展，國族意識在前現代歷史時期略有形跡，但籠罩在君主—臣民關係結構中，從未形成清晰的理論。日本的情況略與中國相似，朝鮮半島因其與中國的長期封貢關係，國族意識更弱一些，印度則因文化多樣性和政治權力的孱弱，國族意識很淡薄。這種差別還需要以更具體的方式來討論，這裏的要點是，國族並不是突兀地由西方帶到亞洲的，但西方勢力東來迫使亞洲各國快速地明晰和重構了自己的國族理念，甚至國族結構。

前現代亞洲有國家，有民族，但是缺乏清晰的國族意識和理論，國族界定模糊，這成為亞洲各國在西方勢力東來以後的國際衝突中處於被動局面的背景之一。西方勢力東來，主要是 19 世紀以後的直接衝突性接觸，迫使亞洲各國快速地明晰和重構了自己的國族理念，甚至國族結構。從而，自 19 世紀以降，整合並強化國族，成為亞洲各國現代化轉變過程所不能迴避的事情。國族建構過程把一個國家內所有成員的認同向國家歸屬層面整合，在社會內部極大地強化了國家的神聖性和政府的權威性，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又被公認為是唯一主權實體，因而現代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國家強化的過程。國族主義的興起——在一些語境中